

SIMON BARON-COHEN

[英] 西蒙·巴伦·科恩——著 高天羽——译

特里·伊格尔顿 推荐
神经科学版“恶之平庸”

THE SCIENCE OF EVIL

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
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SIMON BARON-COHEN

[英] 西蒙·巴伦-科恩——著

高天羽——译

THE SCIENCE OF EVIL

恶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

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

by Simon Baron-Cohen

Copyright © 2012 by Simon Baron-Cohe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的科学 / (英) 西蒙·巴伦-科恩著; 高天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8-1039-7

I. ①恶… II. ①西… ②高… III. ①恶-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08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270mm × 96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3千字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西蒙·巴伦-科恩

SIMON BARON-COHEN, 1958 —

知名临床心理学家，剑桥大学精神病理学教授，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三一学院研究员。毕业于牛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代表作有《恶的科学》《心盲》《关键的区别》和《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等。

高天羽

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有《遥远地球之歌》《鱼为什么放屁》《世界为何存在》《神经的逻辑》《恶的科学》《打开一颗心》等二十余种。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谨以本书纪念

彼得·利普顿 (Peter Lipton, 1950—2007),

剑桥大学科学哲学教授,

他能将精确的解释和幽默热情合而为一

朱迪·露丝·格林布拉特

(Judy Ruth Greenblatt, 1933—2008),

是她在五个子女和五个孙辈的心中埋下了金子

特约编辑：鲍夏挺
责任编辑：罗丹妮
封面设计：高 熹
内文制作：陈基胜
封面插画：业 校

目录

致谢 1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5

第二章 共情水平在人群中的正态分布 19

第三章 囚禁于自我聚焦状态中：边缘障碍、精神病态与自恋人格 45

第四章 在模式中寻找道德：阿斯伯格与自闭症患者 89

第五章 共情基因 115

第六章 对人类残酷行为的反思 135

附录一 共情商数（EQ）量表 173

附录二 如何识别零度共情（负面）类型的人 181

参考文献 187

人名、地名、机构名对照表 211

专名对照表 217

致谢

这本书不是写给天性敏感的人看的。我不可能欢快地论述人类的残酷行为，如果你想找本书来开开心，那就别往下读了。在这本书里，我想用共情（empathy）来重新定义“恶”（evil），并探讨为什么有些人的共情比别人多（或少），以及人失去了共情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主题或许使人痛苦，甚至令人震惊，但共情本身的性质却是魅力无穷的（至少对我来说），它背后的研究也是激动人心的（在这里用这个词有点奇怪），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同事里有那样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科学家。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谢谢他们。

科学家喜欢收集古怪的东西（比如很多人知道，达尔文就喜欢收集甲虫和雀鸟）。而我们这些共情研究者，收集的就是情绪！我们制作了一张名叫《读心》（*Mindreading*）的DVD，里面收集了人类所有的412种情绪。¹我和 Ofer Golan、Sally Wheelwright 以及 Jacqueline Hill 共同建立了这座电子资料库。我还和 Ofer Golan、Emma Ashwin、Yael Granader、Kimberly Armstrong、Gina

Owens、Nic Lever、Jon Drori、Nick Paske 和 Claire Harcup 制作了另一张名叫《运输车》(Transporter) 的 DVD，以饶有趣味的方式向患有自闭症的学龄前儿童传授他们难以理解的共情。^{*}

除了收集，科学家还会开发测量事物的新方法。我们这次的难题，是想出新的手段来测量共情的个体差异。首先我和 Sally Wheelwright、Carrie Allison 及 Bonnie Auyeung 一起开发了共情商数量表 (Empathy Quotient, 见附录一)。为了找到共情可能的隐藏地点，我又和 Chris Ashwin、Bhismadev Chakrabarti、Mike Lombardo、John Suckling、Ed Bullmore、Meng-Chuan Lai、Matthew Belmonte、Jac Billington、John Herrington、Howard Ring、Steve Williams、Marie Gomot 及 Ilaria Minio-Paluello 一起开展了几项脑部扫描研究。为了查明“睾酮[†]造成的麻烦”以及它对共情的影响，⁴我和 Bonnie Auyeung、Rebecca Knickmeyer、Emma Ashwin (née Chapman)、Svetlana Lutchmaya、Liliana Ruta、Erin Ingudomnukul、Lindsay Chura、Kevin Taylor、Peter Raggat 及 Gerald Hackett 收集了胎儿的羊水和成人的血样。我还和 Bhismadev Chakrabarti、Frank Dudbridge、Sharmila Basu、Carrie Allison、Sally Wheelwright、Grant Hill-Cawthorne 及 Lindsey Kent 合作寻找了负责共情的几个基因。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项目。

在撰写本书的同时，我还要维持一间繁忙的实验室顺利运行，这离不开行政人员的大力支援。我要感谢 Gaenor Moore、Paula

* *The Transporters* (2008), DVD, Changing Media Development, www.thetransporters.com. (除非特别标注，脚注为作者原注。)

† 一种雄性激素。——编者注

Naimi、Jenny Hannah、Carol Farmer 和 Rachel Jackson 组成的优秀行政团队。Gaenor 还愉快地为本书编写了参考书目，这是个不小的功劳，我非常感谢她。Bhisma Chakrabarti 和 Mike Lombardo 都曾对初稿章节不吝赐教。尤其是 Mike，在这个过程中他教会了我不少关于社会神经科学的知识，这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感谢英国企鹅出版社的 Helen Conford 和 Stefan McGrath，她们从 2004 年开始就在等待本书完稿！在本书成型的过程中，Helen 提供了富有洞察的细心反馈。我之所以要花 6 年时间写成此书，* 是因为“共情基因”并不是那么快就能找到的。在等待此书诞生期间，我的出版代理人 Katinka Matson 和 John Brockman 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耐心。

我研究共情已经有 30 年时间，现在我的目标是将这个非凡的实体放到桌面上，好让大家能从每一个角度审视它。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盲》(Mindblindness) 中，我曾集中探讨了共情的某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认知方面），以及大量出现共情困难的自闭症。在第二本著作《关键的区别》(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中，我又谈到了共情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和他人的情绪联系，也就是共情的情感方面），以及男女两性在共情上有什么不同。在那本书里，我同样探索了缺乏共情的情况，并分析了自闭症患者在学习这种关键技能时遇到的困难。

而在现在这本《恶的科学》中，我探究了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残酷的行为，以及共情的丧失是否必然会引出这个结果。和前两本相比，这本书挖掘更深，它一直深入到共情的脑部机制，并考察了塑造共情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这本书的论题也更宽泛，详细考

* 本书英文版最初于 2011 年出版。——编者注

察了导致共情丧失的一些疾病。我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探讨中，我把非科学的（unscientific）名词“恶”换成了科学的术语“共情腐蚀”。

我想感谢 Charlotte Ridings 和 Jan Kristiansson 从编辑角度提出的可贵建议，感谢 Basic Books 的 Thomas Keheller 和 Melissa Veronesi 自始至终对我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 Bridget Lindley 对我的全部支持，感谢我的父母（Judy 和 Vivian）和兄弟姐妹（Dan、Ash、Liz 和 Suzie）一贯的幽默，也感谢我的孩子 Sam、Kate 和 Robin 的嬉戏和鼓励。我希望我也能像祖辈对待父辈，以及父母对待我这样，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罐罐金子。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個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极端低温的适应，最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见图1）。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

* 因为没有找到此人，无法征求她的同意使用真名，我在这里替她取了假名。



图1 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经受“冷水浸泡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他们能否在冰冷的水里撑满3小时。（左边是恩斯特·霍尔兹罗纳教授，他的右边是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

关系。²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这些事例之所以特别使人震惊，是因为它们的主事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都是我们从小信任的职业），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却都参与了违反道德的实验或手术。我们权且（大度地）假设，这些医

* 这位教授对在这样不人道的条件下收集数据感到非常难过，但依然觉得这批数据使人获益良多、值得在他这场40多年后的讲座中引用。我对他这样使用数据十分反感，就算它们是用于医学教育的目的，仍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这就是不道德的科学研究，这一点无法改变。

生并不是为表现得残酷而作出这些行为，他们开展浸泡实验只是为了增进医学知识，比方说，船只在冰冷的海面上失事以后，该如何进一步救助生还的乘客。即便是将可怜的戈德布拉特太太的手左右对调后缝合的纳粹医生，或许也不是（我猜想）为了残酷而残酷的，他们或许也是在追随科学发现的冲动，想找个法子探索显微外科的极限。

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 subject 也有“主体”的意思。——译者注

† 见注释4。——编者注